

親職化中的子女主體性：來自於「孝道」研究的啟示

張晨光 劉經偉

摘要

作為來源於家族系統治療理論的重要概念，「親職化」(parentification)在親子關係領域得到廣泛研究。然而，隨著親職化實證研究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聚焦於子女單方面的親職化行為而脫離其社會文化、家庭脈絡，且其研究結果呈現出正反兩面結果並存的「雙面格局」。本文在系統性回顧親職化實證研究後，在華人孝道文化中子女主體性思想的啟發之下，建議相關研究重視親職化過程中子女的主體性(agency)。最後，在親子關係雙邊模型思想的指導下，本文納入親職化家庭脈絡以及子女的雙元自主性，構建出親職化研究的整合模型，嘗試為後續研究提供更為整合性的理論架構。該模式主張，子女在家庭脈絡中感知到親職化需求，表現出親職化角色行為，從而體驗到親職化情緒感受，進而影響到其心理發展結果。在此歷程之中，父母自我分化會調節父母對子女親職化角色行為的反饋，而父母的反饋則又調節親職化角色行為與親職化情緒感受的關係；子女主體性調節感知到的親職化需求與親職化角色行為的關係，以及調節親職化角色行為與親職化情緒感受的關係，並直接影響到心理結果。

關鍵詞：主體性、孝道、親職化、雙元自主性

張晨光 西南民族大學教育學與心理學學院；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通訊作者：chenguang_1211@163.com)

劉經偉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壹、緒論

親職化這一專業術語，準確地講是由 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 首次正式提出，意指「一種主觀扭曲的關係，個體在這種關係中期待伴侶甚至是孩子充當自己的父母」(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 p.151)。其實，這種現象之前就曾經被 Morris 與 Gould (1963) 界定為角色翻轉 (role reversal)，用以描述遭受虐待的父母反而視其子女為一種關鍵、有力量的父母角色 (critical and powerful parent figures)。家族治療大師 Minuchin 等人 (1967) 在對貧民區家庭進行觀察後，也曾使用「親職兒童」(parental child) 一詞指稱由於經濟或社會條件問題在家裡承擔父母責任的兒童。同樣是家族治療學者的 Kerr 與 Bowen (1988)，將親職化納入親子三角關係類型之中 (其他兩種類型分別為跨世代聯盟與代罪羔羊)，意指子女非常積極介入父母的問題當中，甚至將父母衝突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Jurkovic (1997) 在繼承 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 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親職化概念的內涵，通過區分「破壞性親職化」與「適應性親職化」使親職化擺脫病理化理論假設，還將親職化行為進一步區分為工具性照顧 (照顧手足、承擔家務等) 與情感性照顧 (扮演父母的朋友、緩衝父母之間的婚姻衝突等) 兩個面向。在此理論基礎上，Jurkovic 與 Thirkield 編製的親職化測量工具—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 (FRS) (引自石芳萌，2007) 成為該領域影響力最大的測量工具。此後，親職化在世界各地的實證研究領域得到蓬勃的發展，幾近成為家庭心理學研究領域「無處不在」(ubiquitous) 的

議題 (Hooper, Decoster, White, & Voltz, 2011)。

如今，「親職化」已經由鮮為人知的家族治療專業術語，儼然發展成普通民眾的日常用語。然而，該領域的實證研究開始聚焦於子女的親職化之表顯行為，而脫離其家庭系統乃至社會文化脈絡，相關研究結果也呈現一種積極結果與消極後果並存的「雙面格局」。因此，本文對親職化實證研究進行梳理，並在華人文化中的「孝道」(filial piety) 思想之啟發下，建議將子女主體性納入親職化研究之中。此後，在考慮社會文化、家庭脈絡的同時，結合親子關係雙邊模型，嘗試構建親職化研究的整合模型。

貳、「親職化」的影響是病理化，還是高適應性？

一、親職化影響的雙面結果

也許是因為其「病理」理論來源，親職化在實證研究領域更多地被視為一種威脅個體童年以及成年發展的危險性因素 (Nuttall, Zhang, Valentino, & Borkowski, 2019)。以兒童、青少年為對象的實證研究發現，親職化能夠負向影響兒童的學業成就 (Siskowski, 2006) 與青少年的心理適應 (Chen & Panebianco, 2020)，正向預測青少年的憤怒、抑鬱等情緒 (Zarczyńska-Hyla, Zdaniuk, Piechnik-Borusowska, & Kromolicka, 2019)。為考察親職化對於成年後心理發展的影響，Hooper、Decoster、White 與 Voltz (2011) 對此前 40 年親職化回溯式研究的後設分析發現，自我報告的童年親職化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與成年後心理病理結果 (包括抑鬱、物質成

癮、焦慮、PTSD、人格障礙、進食障礙等)之間存在顯著性的正相關,但其相關係數處於低等水準($r = .14$)。除心理病理結果以外,相關實證研究發現童年親職化還可以預測大學生的自我能力否定傾向(Castro, Jones, & Mirsalimi, 2004)、負面影響大學生的學業成就(Chase, Deming, & Wells, 1998)。可見,在親職化被提出後的近半個世紀,其對心理發展的消極影響一直是學者所關注和討論的熱點,幾近成為學界共識(axiomatic)。與此同時,研究者們也漸漸在兒童青少年以及成人身上發現親職化的積極影響。比如,親職化與兒童/青少年的人際勝任力(Champion et al., 2009; Kuperminc, Jurkovic, & Casey, 2009)、適應性應對技能(Stein, Rotheram-Borus, & Lester, 2007)、自我效能感(Titzman, 2012)、復原力(Ungar, Theron, & Didkowsky, 2011)、心理適應(Tompkins, 2006)等存在顯著性關聯,而童年親職化也可以正向預測大學生的復原力(Yew, Siau, & Kwong, 2017)、增進認知層面上的同理心覺知(Mijl & Vingerhoets, 2017),使其更容易成為助人工作者(DiCaccavo, 2002)。

近十年來,台灣與大陸學者開始陸續引入「親職化」概念進行實證研究,同樣出現了類似前述西方實證研究的雙面結果。一方面,台灣學者對高中職學生開展的研究發現,親職化程度越高,其身心健康狀況就越差(石芳萌、吳麗娟、林世華, 2010; 簡匯育, 2010); 陳慧珊與吳麗娟(2013)改編高中職學生的親職化測量工具並將其應用於大學生群體後同樣發現,大學生的「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越高,其身心狀況就越不健康。大陸地區

對青少年親職化的研究也發現,女中學生的情感性親職化與不公平性兩個向度對羞恥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王聃, 2013),而且親職化能夠正向預測初中生的攻擊行為(王玉思, 2017)。另一方面,華人文化脈絡中的相關研究也探索到親職化與一些積極心理結果之間的關聯。其中,侯季吟與蔡麗芳(2013)對弱勢家庭開展的研究發現,兒童、青少年的親職化表現越高,其利社會行為的表現也越高。而利用「三角關係運作量表」中的「親職化」分量表開展的研究也發現,小學生的親職化水平愈高,其行為問題的發生率反而愈低(張虹雯、郭麗安, 2000),其學校適應及社會功能愈好(Wang, Liu, & Belsky, 2016)。此外,李董平等(2010)大陸學者對大學生群體開展的親職化回溯研究結果也顯示,兒童時期的家庭照料對心理健康、韌性和自尊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由前述可知,雙面結果不但出現於對兒童、青少年所開展的親職化研究中,在以大學生為代表的成年人親職化的回溯研究之中也有所體現。雖然學者們使用的親職化測量工具不同,但目前尚沒有系統回顧或後設分析發現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能夠左右親職化的影響是「適應性」還是「病理化」。因此,學者們更多地圍繞親職化現象的特徵及其影響因素來對上述雙面結果的研究局面進行解釋。

二、對於親職化雙面結果的解釋

(一) 辯證關係

親職化既可能帶來消極心理後果,也有可能帶來積極心理影響——這一點早在提出該術語之初便有所論述。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 (1973)承認親

職化是在健康家庭也有可能出現的普遍現象，不能被無條件地歸類於心理病理領域(realm of “pathology”)或者是關係的失功能(relational dysfunction)，同時又在其中將親職化設定為家族治療中用以「描述病態家庭動力」(describing a facet of pathogenic family dynamics)的術語。沿襲這種辯證思路，後續的實證研究者中，有的籠統地將親職化的影響視為「一個硬幣的兩面」(Mijl & Vingerhoets, 2017)，有的則視其為一種「有代價的勝任力」(competence at a cost) (Kuperminc et al., 2009)。從這種意義上講，親職化在兒童青少年的心理發展中會產生「一種相對辯證而絕非好壞的影響」(黃宗堅、李佳儒、張勻銘, 2010)。一方面，親職化經歷對於子女而言是一種鍛煉，可以提升其照顧他人與獨立承擔的能力與長大後的社會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子女由於過度承擔親職化任務或過度認同其照顧者角色而忽略自己的需求，尤其是在孩子沒有得到作為「孩子」應得的照顧與滋養時，這種經歷反而會對其幸福感與心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二) 公平感

相較於前述親職化影響的「辯證觀點」，Jurkovic (1997)則直接將親職化區分為「破壞性親職化」(destructive parentification)與「適應性親職化」(adaptive parentification)兩種。其中，「破壞性親職化」是指子女過度擔負照顧的角色且無支持的環境時，將損害他們的身心發展；「適應性親職化」則發生在親職化現象為短暫的照顧責任時，子女容易從中學會照顧的特質與技巧，並從中獲得自我價值感，被支持與公平對待，這可能有助於

他們將來的各項心理發展。

顯然，Jurkovic 除了關注到前文提及「親職化程度」(「過度承擔照顧的角色」還是「短暫的照顧責任」)以外，還引入了「公平感」或者「支持感」用以區分「破壞性」與「適應性」親職化。易言之，子女親職化行為影響的「好壞」，端視其主觀知覺到親職化行為能否得到對等與公平的回應。從某種意義上講，子女的親職化行為本身並不一定造成其心理方面的負面影響，也許他們「並不畏懼辛苦，怕的是付出得很辛苦卻又無法被肯定或被了解」(黃宗堅等人, 2010)。

由於 Jurkovic 與 Thirkield 編製的親職化測量工具 (FRS)(引自石芳萌, 2007)中在區分工具性與情感性親職化之外納入了「不公平感」這一向度，後續關於公平感的親職化實證研究得以順利開展。以美國大學生為研究參與者的研究 (Jankowski, Hooper, Sandage, & Hannah, 2013)發現，感知到的不公平感(perceived unfairness)在親職化與心理健康症狀之間具有顯著性中介作用。這就意味著，在考慮不公平感之後，親職化行為對心理健康的影響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不公平感來實現的。嚴格意義上講，該研究結果只是部分地驗證了 Jurkovic (1997)的觀點(「破壞性親職化」的發生機制)，即個體在親職化過程中感受到的不公平感影響著親職化負面影響的程度。對照「破壞性親職化」中的不公平感，「適應性親職化」中就應當伴隨一種價值感或者獲益感。雖然 Hooper (2009)在其編製的「親職化量表」(Parentification Inventory, PI)中增加了「感知到的獲益」(perceived benefits of parentification)向度，但目前尚未發現關

於親職化積極結果的中介研究，因此無法支持 Jurkovic (1997) 所謂的「適應性親職化」之發生機制。而且，「不公平感」也並非真正的問題所在，而更像是親職化影響的「指示燈」，受到父母需求強度、自身發展需求、與手足親職化行為的社會比較、父母的反饋以及文化價值觀等各種因素的影響。

(三) 文化因素

相對於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學者，來自於其他文化(如華人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土耳其文化等)脈絡的學者則嘗試採用「文化視角」對親職化的影響予以闡述。由於受到親職化概念病理化假設以及實證研究所發現的親職化消極後果之影響，一些學者的論述集中於文化因素在消極後果產生機制中的緩衝作用，尤其強調親職化在其文化脈絡中並不必然屬於「病態現象」。比如，利翠珊與陳富美(2004)從華人家庭「共依附」(co-dependence)的互動關係特徵出發，指出西方家庭系統理論中所謂的「清楚界限」假設與華人「家人一體」的信念產生衝突。如此，西方親職化理論中所強調的「自我分化」問題，便無法全然適用於重視親屬關係以及角色規範與義務的華人社會(黃宗堅等人，2010)。同樣來自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的一項研究(Lee & Kim, 2019)發現，多元文化脈絡家庭中的親職化對子女的內化問題有顯著之預測作用，而單一文化(傳統儒家文化)脈絡家庭中則未表現出這種顯著性，這也側面論證了親職化病理假設在東方文化中的不適切性。

而在解釋親職化與積極心理發展結果(如，利社會行為等)的關聯時，學者們更是紛紛主張其文化脈絡中的親職化

也可能是一種「正常」乃至於「健康」、「積極」的現象。比如，來自於拉美文化(Jurkovic et al., 2004)與土耳其文化(Zencir & Haskan-Avci, 2019)的學者指出，兩種文化都將兒童承擔成人責任看作是對需要幫助的父母之正常反應，對其所在家庭有積極意義，並且受到其社會文化的支持。在這種文化脈絡下，那些毫無親職化行為的子女反而被視為是「不忠於家庭」(unfaithfulness)的。這一點在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響的華人家庭之中更為突出，子女極有可能因為遵循孝道之社會規範而產生親職化行為，比如「子代父職」、「長兄如父」、「長姐如母」等為家庭、手足、父母所做出的照顧、關懷、奉獻、犧牲等行為，而這些行為常常被視為子女的孝道實踐而被社會所肯定，進而獲得父母的讚許與家中的地位。如此，在孝道(或家族主義)文化脈絡中的親職化行為是可以得到支持乃至於賞識的，親職化子女很有可能產生「角色滿足感或價值感」而非「不公平感」，恰恰符合前述 Jurkovic (1997) 所界定之「適應性親職化」。於是，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兒童便可能將其在家中符合孝道的親職化表現，經由孝道的家庭化歷程，類化成為家庭以外人際關係中的利社會行為(侯季吟、蔡麗芳，2013)。

也許如利翠珊(1997)所言，親職化這種在西方社會中所指稱「病態義務關係」可能正是中國人沾沾自喜的傳統孝道。真的如此嗎？

參、「親職化」也是一種「孝道」？

一、親職化定義的澄清

對於親職化的諸多描述之中，有的學

者將其視為一種「扭曲的關係」(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有的學者視之為親子間的「角色翻轉」(Morris & Gould, 1963)或「角色混淆」(role confusion) (Macfie, Brumariu, & Lyons-Ruth, 2015)，有的學者認為親職化是一種「代際間的界限消融」(generational boundary dissolution) (Nuttall & Valentino, 2016)，有的學者索性跳脫上述「病理化」的描述，使用更為中性的術語——「子代責任」(filial responsibility) (Jurkovic et al., 2004)。誠然，親職化的核心意涵是子女照顧父母，這翻轉了「本應該給予照顧」的父母角色與「本應該接受照顧」的子女角色。但是，家庭之中的角色責任分工會受到社會文化之影響，即便同一文化脈絡中的不同家庭也會有所差異。易言之，研究者無法指定一種統一標準來區分某個行為究竟是父母角色，還是子女角色。這無疑給實證研究中的測量工具研發帶來很大的難度。而考慮到「界限不清」(inadequate boundaries)或「界限消融」更像是親職化發生的條件，「扭曲的關係」帶有明顯之病理化傾向，「子代責任」容易與後面談到的「孝道」相混淆，本文主張繼續使用親職化一詞，並且將其定義為一種「心理過程」。

雖然親職化更多地外顯為「行為」，相關的測量工具也偏向於評估照顧行為的程度，然而作為家庭系統理論中的關鍵概念，親職化常常被放置於家庭系統脈絡之中予以討論。比如，早期的臨床學者們在論述中偏於強調親職化的引發脈絡，即由於嚴重經濟問題、身心障礙、婚姻衝突或者突發衝擊事件所導致的父母失功能；而後來學者們在對親職化雙面結果進行解釋時，則更多地考慮子女是否獲得支持或

不公平感，以及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如若僅以行為來觀察親職化，必然落入一種片段、斷裂的視角而無法窺其全貌。綜上考慮，親職化應該被定義為在社會歷史文化與家庭脈絡之中，兒童、青少年在情緒情感、生活事務等方面照顧父母、手足乃至於整個家庭的心理過程。

親職化過程有可能發生在父母失功能或者功能不彰的脈絡之下，父母無法有意識地、理智地顧及子女的需求，反而要求子女更多地去考慮如何滿足父母的需求(Kerig, 2005)。在這種家庭脈絡之下，子女在理應得到照顧的年齡無法得到較好的照顧與滋養，而親職化這種跨越親代界限的行為又使得子女與父母關係過於粘膩而無法很好地「自我分化」。於是在子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後便會「重蹈覆轍」，呈現親職化世代傳遞的特徵。這是臨床領域關於病理性親職化的一種頗具影響力的觀點。然而隨著家庭系統理論的不斷發展，學者們逐漸意識到「父母失功能或者功能不彰」並非親職化發生之必要前提。即便是功能正常的父母，由於工作、家庭或者是照顧多名子女的壓力，也難保不會在維持與照顧家庭時力有未逮。此時，作為在家庭系統之中與父母緊密互動的子女，自然萌生出輔助或替代其角色的想法，進而付諸行動去照顧父母或者手足。長期或過於繁重的親職化行為會在子女正常的成長發育中增添額外的負擔，影響其自我需求的滿足以及家庭之外的人際交往與學業發展。同時，親職化的子女可能在這樣的照顧者角色中獲得價值感與勝任感，抑或因為文化價值的強化而體驗到角色滿足之感。脫離病理化立場之後，這樣的觀點可以更好地呼應前述親職

化的雙面結果。

二、親職化與孝道

在概念澄清之後，發軔於西方現代家族系統治療理論的「親職化」與源自於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似乎產生了一種「對話」的可能性。所謂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為主要對象的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之組合」，包括認知（孝知）、情感（孝感）、意志（孝意）和行為（孝行）四個面向（楊國樞，1988）。其中，孝道行為應該是「子女於家庭中承擔的，朝向父母的保護性、照顧性與責任性任務」（Karpel, 1976），而這恰恰也是西方學者對於親職化的一種描述。因此，單就行為表現的面向觀之，親職化與孝道行為都屬於子女所施為的以父母為主要對象的廣義照顧行為；通俗而言，就是「為父母好」的行為。

撇開病理化意涵，在東方傳承千年的孝道似乎比親職化擁有更為寬泛的適用人群與意義內涵。在適用人群方面，目前的親職化所關注的是兒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即便以成年人（如，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也基本是通過回溯的方式測量其童年時代的親職化。然而孝道似乎沒有刻意強調適應於哪個年齡的人群，更沒有將孝道限制於兒童青少年群體。雖然廣為流傳的《二十四孝》中「臥冰求鯉」、「扇枕溫衾」、「哭竹生筍」等故事與青少年行孝有關，但民眾心中之孝道更多地指向成年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行孝。此外，經歷千百年遞嬗傳承的孝道思想內涵豐富而多元（葉光輝，2009），楊國樞（1985）曾通過對古典文獻進行內容分析歸納出傳統孝道的 15 項主要內涵：敬愛雙親、順從雙

親、諫親以理、事親以禮、繼承志業、顯揚親名、思慕親情、娛親以道、使親無憂、隨侍在側、奉養雙親、愛護自己、為親留後、葬之以禮、祀之以禮。若以較為鬆散的方式將這些內涵與親職化進行對照，其中「事親以禮」、「隨侍在側」、「奉養雙親」等與親職化的「工具性照顧」面向頗為相似，而「娛親以道」、「使親無憂」等關注父母情緒與精神的內涵則與「情感性照顧」有些關連。在剩餘之孝道內涵中，即便排除諸如「為親留後」、「葬之以禮」、「祀之以禮」等與兒童青少年無涉之條目，「愛護自己」、「繼承志業」、「顯揚親名」等內涵也已超出親職化的概念內涵。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學者根據角色對象對親職化的內涵進行劃分，提出所謂父母的父母、手足的父母、父母的配偶等親職化角色(Mika, Bergner, & Baum, 1987)。單就行為面向來看，「手足的父母」這種角色行為已經超出狹義孝道的內涵。但是如果將做「手足的父母」視為「使親無憂」的手段，這種親職化行為仍歸屬於廣義的「孝悌之道」。坦誠地講，作為理論來源、視角與研究發展均不相同的兩個概念，孝道與親職化並不能進行這種簡單、直接的比較。本文亦無意對二者的異同之處做過多之討論，只是嘗試在孝道研究或者東方傳統文化之中獲得一種重新審視親職化研究的視角。

三、來自於孝道研究的啟發

雖然流傳至今的孝道思想中包含服從權威與階序規範的強制面（葉光輝，2009），乃至於所謂「愚孝」，但孝道思想的源頭—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所主張的更多是相對性倫理要求。孔門言論中有

「父慈子孝」(禮記·禮運)及「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孔子家語·卷四·六本)一說，至隋朝初年《顏氏家訓》則直言「父不慈則子不孝」，即便在禮教嚴苛的明朝小說《封神演義》中都有「父不慈，子奔他鄉」的說法。可見，傳統孝道思想注重的是子女出於自然情感的自發行孝，因此先賢給出了無法產生「出於自然情感的自發行孝」時的解決策略——「逃走」或「奔他鄉」，而非將子女死死地捆綁在社會制度規範之上。而這種發自「每個人內心的天性之愛」或者「不能自己的情感流露」便是孟子所倡導之「赤子之心」(孟子·離婁下)，那種嬰兒「見父自然知愛」(蔡家和，2016)的天性。由此「赤子之心」的親子之「孝」拓展至手足之「悌」，進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乃至「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社會」。無怪乎明儒蔣信主張「赤子之心便是聖胎」(明儒學案·卷二十八)，孝道中子女的自願自發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詩經·毛詩序)。情(親子之間的強烈情感)是子女行孝的重要動力來源，禮義(廣為接受的社會規範)在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中不斷內化，也成為子女行孝的驅動力量之一。雖然社會規範面向的孝道帶有「外在強制」的意涵，但一旦社會規範被內化為個體自己的信念，孝行便不再必然是為外界所驅動的「迫於無奈」。無論如何，孝行都是子女在面對親子情感與內化社會觀念時做出的行為選擇。易言之，孝道行為為子女所驅動。在主體性——誰驅動了行為——這個問題上面，傳統孝道思想與新時代的孝道觀念都沒有將子女視為一種被動行孝的「工具」；相反地，這些孝道觀念均反復強

調主動行孝，將子女視為行孝之主體，亦即孝道行為之發起者。這就意味著行孝並不以父母年老、失能等為前提條件，其主動權掌握於子女手中。因此，子女的主體性在孝道思想之中得以彰顯。

可惜的是，親職化的相關文獻鮮少提及子女的主體性。雖然親職化研究所關注的是子女，但子女顯然並沒有被視為行動之發起者。這也許是因為在最初的親職化之病理化理論假設中，子女只是處於一種「被動接受」的狀態，完全被「功能不彰」或者「力有未逮」的父母有意、無意地分配工具性或情感性的親職化任務，而且「照單全收」。問題是，即便在父母功能不彰的情境之中，子女有無可能發揮其主體性，基於親子間強烈的感情而主動做出親職化行為呢？抑或，子女在家庭系統之中意識到父母的需求或期待時，他們有無可能有策略地拒絕或部分滿足父母需求呢？概括而言，親職化過程中會不會存在子女的主體性呢？

肆、親職化過程中子女的主體性

一、親子關係雙邊模型

長久以來，心理學研究中的孩子往往被視為發育不全、脆弱的存在，只能被動地對成人或社會做出反應(Prout & James, 1997)。在親職化相關研究中，子女同樣被當成被動的個體，其親職化行為與感受儼然完全是由其父母的功能不彰所發動。然而，這卻與其所植基的家族系統理論之假設不相一致。根據系統理論之觀點，處於家庭系統之中的父母與子女，均對家庭中之親子互動有所影響。因此，於理論上講，父母與子女都應該影響親職化的表現及

其後續結果；雖然作為成年人的父母應該為家庭關係與子女的健康成長承擔更多的責任，但不能在理論層面簡單地將「適應性親職化」的希望僅僅寄託於父母「考慮子女需求」的情況下給予適量的親職化任務，並在其後支持、讚賞子女的親職化行為。來自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一項研究(Nuttall et al., 2019)發現，母親過往的親職化經歷只有在子女屬於「容易」氣質時才會增加子女的外化問題行為。雖然，該研究沒有直接研究子女氣質在其親職化中的作用，卻凸顯出子女在面對問題父母時來自於自身的「影響力」。

早在 30 多年前，親子關係研究領域的學者便開始對這種父母對子女的「單向影響」進行反思。相對於過往學者對孩子的「被動」假設，很多學者主張孩子不僅僅接受環境之影響，而且能夠影響乃至修正環境。基於這種觀點，Kuczynski、Harach 與 Bernardini (1999)提出親子關係的「雙邊模型」(bilateral models)，主張在親子關係研究中同時考慮親子雙方的主體性以及來自於雙方的影響。一項對中國大陸獨生子女家庭的研究發現，在祖輩參與撫養的脈絡之下，孩子位居家中的「小皇帝」(little emperor)地位，他們反而會利用複雜的家庭人際關係幫助自己獲得權力(power)，主動地、策略性地影響家人，乃至拒絕父母提出之要求(Goh & Kuczynski, 2009)。其實，子女的主體性(agency)不必然以上述家庭中父母的「寵溺」為前提，也可以存在於倍受約束的環境(constrained circumstances)之中。Katz (2015)通過梳理家庭暴力相關的研究發現，即便在家庭暴力這種極端不健康的家庭之中，子女的主體性仍然有所體現，不

但可以主動在情感方面支持受虐的母親，還能夠協助母親做出離開的決策。照此邏輯，子女的主體性不需要以「理性」(rationality)或者「自由」(freedom)為前提，即便在家庭系統之中面對父母功能不彰時，主體性也會對其後續所採取的親職化行為有所影響。一項實證研究發現，父母的婚姻衝突越強，子女感知到的主體性也越強(Schermerhorn & Cummings, 2005)。

二、主體性

主體性最早作為一個政治哲學術語被提出，20 多年前引入兒童心理學研究領域用以描述孩子作為「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的能動性(Prout & James, 1997)。作為強調「自我」能動性的概念，意涵上很容易與「獨立」相聯繫，而這種獨立又常常與「分離」與「去依附」有關。畢竟，如果個體所做出的行為完全符合外界之要求的話，從外面觀之，是無法辨別其中有無主體性的。因此在歐美個人主義的文化脈絡下，主體性被定義為一種與環境相分離的、抵抗外界影響的自主性。因此，實證研究中用以測量主體性的「主體性人格問卷(Agentic Personality Scale)」(Côté, 1997)中有兩個向度是與自我有關的自尊(self-esteem)和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前述親職化理論中，子女的親職化行為被假設為由父母的功能不彰或父母有意、無意提出的需要所驅動。而親職化就其表現而言，是子女被動滿足父母或家庭需求的行為，恰恰與前述主體性的「分離」與「去依附」屬性相反。如果子女具有較高的主體性，自然會表現出與家庭、父母的分離，乃至於抵抗家庭、父母所提出的

要求，也就很難或較少產生親職化之行為。前述親職化與前述主體性的這種對立關係，也使得過往的親職化研究者們無法在其理論模型中納入「主體性」這個近些年十分熱門的議題。問題是，主體性只能體現為「分離」與「去依附」嗎？

越來越多的文化心理學者形成共識，即主體性應聚焦於個人能否自我決定，而且這種自我決定可依循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朝向多元的適應目標(Chirkov, Ryan, Kim, & Kaplan, 2003; Miller, 2003)。日本學者 Markus 與 Kitayama (2003)指出，前述強調自我「分離」與「去依附」的主體性並非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所以為的一般模型(general model)，而只是一個特定文化模型(particular model of agency)，應該被稱為「分離主體性模型」(disjoint models of agency)。與其相對應的還有一種強調關係的「連結主體性模型」(conjoint models of agency)，個體關注於他人及與他人互動時的相互依賴，其行動取決於個人的義務、他人或角色或情境的期待。顯然，無論其自我決定時重點考量的是個人的自我獨立，還是關係的相互依賴，只要個體的自由意志有所展現，就是其主體性的體現。

三、雙元自主性

由於心理學上的主體性一直以來缺乏明晰的界定與描述，且容易與哲學概念的主體性相混淆，故而一些學者建議在實證領域使用其近義詞自主性(autonomy)開展研究(Sutterlüty & Tisdall, 2019)。如前文所述，主體性回答了「什麼驅動了個體的行為」這個問題，反映的是「行動中的自我」(self in action)。而自主性則是主體

性在個體生活運作中的一種體現，其所反映的不是個體主體性的有無，而是其主體性的強度以及面向。十餘年前，Yeh 和 Yang (2006)就在 Markus 與 Kitayama (2003)主體性理論的基礎上提出雙元自主性模型(dual autonomy model)，主張自主性是一種生活適應能力，個體可依據在生活中所面臨的獨立與相依之多元價值訴求，對應地發展出個體化自主性(individuating autonomy)與關係自主性(relating autonomy)。其中，個體化自主性意指個體能透過對抗外在限制或表達個人內在特質與特色的行動來達到獨立的自我認同，並且展現其自由意志的適應能力；而關係自主性則指個體能以維繫人際關係品質及超越自我角度的行動來達到相依的自我認同，並且展現其自由意志的適應能力。此外，作為對 Markus 與 Kitayama (2003)主體性理論的超越，雙元自主性模型主張個體化與關係自主性發展可以並行不悖地共存(coexist)於單一個體身上。

在雙元自主性模型中，自主性「聚焦於個人的生活適應」，追求所謂「行動的自我決定」(吳志文、葉光輝，2015)。因此，作為主體與社會行動者的兒童青少年，為因應來自於日常生活中父母功能不彰、力有不逮或其他家庭變故，即有可能出於其個體化自主性表達對父母或家庭需求的對抗與拒絕，從而較少地表現親職化行為；也有可能出於其關係自主性承擔更多社會規範的角色行為或者滿足父母、家庭的需求，從而表現出較多的親職化行為。退一步講，也許子女的親職化行為是因應父母的功能不彰而發生，但作為子女所施為的行為，一定蘊含某種程度的子女自主

性。這種自主性可以表現為兩個方面：自我決定的能力與自我決定的面向。Yeh 和 Yang (2006)所編製的「青少年自主性量表」，從認知、調節及情感三個面向來評估青少年自主性的發展程度，即分別從個體化與關係自主性兩個方向來測量自主性能力水平。而學者們（Yeh, Liu, & Yang, 2007；Yeh & Yang, 2006；吳志文、葉光輝，2011、2015）採用此測量工具開展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雙元自主性模型的範疇優越性假設，發現個體化自主性的功能主要發揮於個人範疇的生活適應上，如增進主觀幸福感與自我價值、降低個人憂鬱、壓力，以及焦慮等內化問題感受；而關係自主性的功能主要作用於人際範疇的生活適應上，如提升個人同理心與親子關係、降低個人暴力攻擊與偏差等外化問題行為。不難發現，雙元自主性對心理適應所帶來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與親職化影響的雙面影響「遙相呼應」。

因此，未來的親職化研究十分有必要考慮將子女的主體性納入其研究模型，來仔細回答這三個問題：

- 1.親職化行為發生之前，子女的主體性如何在親職化脈絡情境中運作？
- 2.子女主體性的運作，如何影響親職化行為的表現以及後續感受？
- 3.子女在親職化中的主體性，又如何影響其心理發展？

伍、親職化研究整合模型

綜上所述，親職化研究應該考慮發展一種理論整合模型，實現親子雙方的整合、親職化行為與主體性的整合、消極後果與積極結果的整合。

首先在整合模型之中，親職化被定義

為「在社會歷史文化與家庭脈絡之中，兒童、青少年在情緒情感、生活事務等方面照顧父母、手足乃至於整個家庭的心理過程」。作為一種「過程」，親職化必然包括其發生、發展之脈絡、認知觀念、行為表現、心理感受等面向。因此，研究模型整合的首要任務就是引入「脈絡」變項。社會文化脈絡中，諸如家族主義或孝道等對於親職化的影響，前文已經有所論述。家庭作為與親職化關係更為密切的脈絡變項，是整合模型更為關注的一個面向。脫離「病理化」假設之後，父母的失功能或功能不彰不再是親職化發生的必要條件，但父母或手足在家庭中的表現以及家人之間的互動等仍然對親職化行為的發生產生重要影響。回應前述之親子關係雙邊模型，目前親職化研究重點關注的僅僅在於子女的親職化行為、親職化感受以及其影響結果等，顯然只屬於親子關係的「一邊」。將家庭中父母乃至於手足的表現納入研究模型，是更為系統地考察親職化過程的必經之路。期待在以後的實證研究之中，看到更多來自於親子對偶數據的分析。

其次，既然研究主題是子女所施為之親職化行為，必然無法迴避子女之主體性。所以，將子女主體性納入親職化研究模型可以讓研究者從「父母」轉換到「子女」視角看到更多的訊息。親職化研究如果只是將子女視為「被動受害者」，由前述觀點可知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而這種親子關係單邊思維也不利於打開實務工作之視野。試想，個案回顧親職化經歷時，若一味在諮商師的陪伴下將其視之為消極被害的體驗，便很難產生對過往經歷「乖小孩」重新詮釋(黃宗堅等人, 2010)，

更無法看到自身主體性與能動性背後的資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將主體性納入親職化研究之中並非主張子女應該為親職化行為負責，更加無意主張子女的主體性可以左右親職化的發生與否。正如 Schermerhorn 和 Cummings (2005) 所強調的，子女感知到的主體性與其展現出的自主性行為並不能等同而觀。很多時候，孩子由於其實際能力有限以及環境的限制，感知到的主體性並不能完整地表達為自主性行為。

再次，發源於中國先秦儒家的孝道，自漢朝以降被不斷推崇，乃至成為治國、齊家、修身之「無上真理」，至近代方被先進學者激烈批判；而來自於歐美家族系統治療理論的親職化，無論於心理治療實務還是實徵研究之中均帶有一種「病理化」底層色彩，近十年來才有實徵研究學者檢

視其與積極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這樣兩種在「病理—積極」向度上完全相反的研究進路，提示相關領域學者應當採取一種兼執兩端「中道」態度。因此，在目前只關注一方面結果（積極適應或消極症狀）的研究基礎上，需要將兩個方面的結果辯證性地整合入研究模型之中。而雙元自主性模型的納入，恰恰可以有效整合親職化研究的正負兩面結果。過往實證研究未對子女親職化行為的自主性進行區分，「一股腦兒」地測量到的親職化行為，既有可能偏於低個體化自主性而發現其與憂鬱、焦慮等內化症狀的正向關係，也有可能偏於高關係自主性而發現其與人際適應、親社會等行為之間的正向關係。也許，目前親職化研究結果之混亂，皆由忽視「主體性」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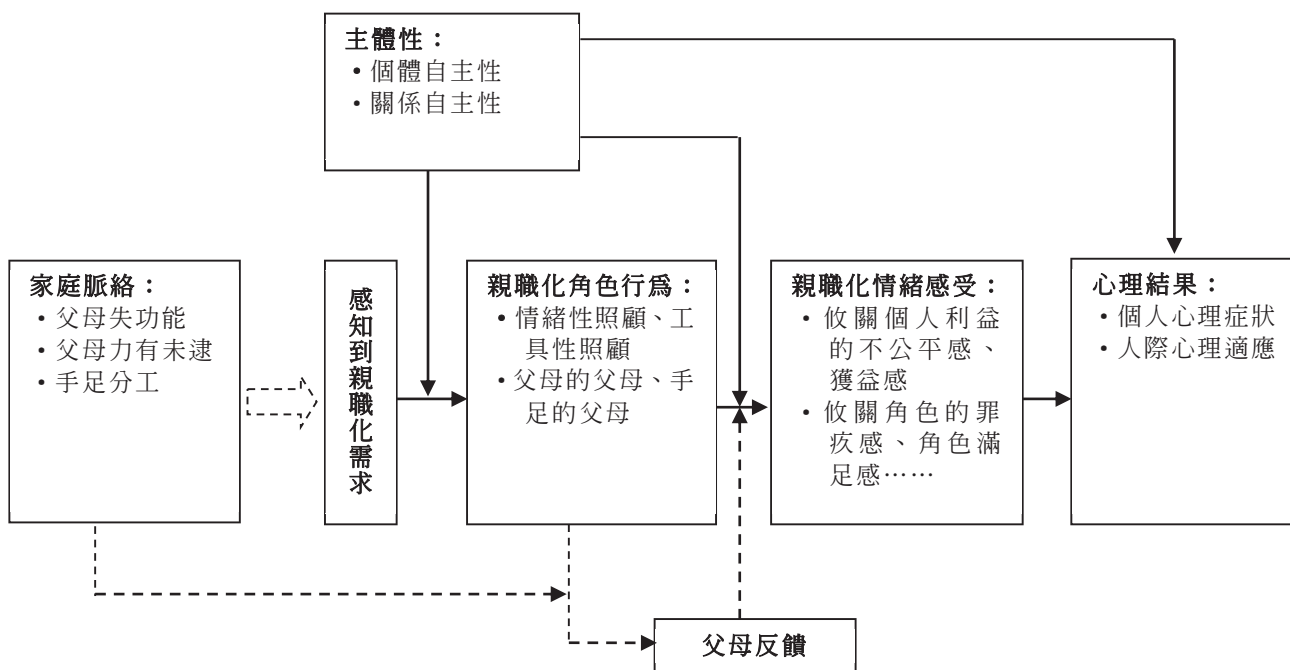


圖 1. 親職化研究整合模型

將親職化發生之社會文化、家庭脈絡、子女主體性、親職化感受及親職化正負面結果進行整合的研究模型如圖 1 所示。首先，在家庭系統中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的父母失功能或者在維持家庭方面的力有未逮，是親職化發生之家庭脈絡。在這種情境之中，子女因其敏感程度而感知到不同程度的「親職化需求與期待」(Mijl & Vingerhoets, 2017)。其次，子女的主體性會調節其因應父母需求與自身需求而做出親職化行爲的過程。在此模型中，子女的主體性主要通過個體自主性與關係自主性予以體現。其中，個體自主性高的個體會在感知父母需要的情況下較少做出親職化行爲，而關係自主性高的個體則會因其關係導向的自我決定而做出更多的親職化行爲(Yeh & Yang, 2006)。再次，父母會根據其所感知到的子女親職化行爲而給予反饋，有些父母因爲自身分化不良或失功能程度嚴重往往容易忽視子女爲家庭所做的貢獻而較難給出支持性的反饋，而那些受孝道思想影響較多且功能正常的父母則更容易關注子女的需求，也更容易給予子女親職化行爲更多的鼓勵和支持(吳嘉瑜、張盛堂，2004)。在親職化過程中，子女的情緒感受既取決於其親職化行爲程度(Jankowski et al., 2013)及親職化行爲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其主體性(Louise, Cushway, & Cassidy, 2007)，同時也會受到前述父母反饋乃至於手足的分工等因素之調節(張縉鏐，2018)。比如，子女的親職化行爲較多且較少得到父母支持性反饋而其個體化自主性較強的話，很容易體會到不公平感；當其親職化行爲較多但能夠得到父母支持性反饋且其關係自主性較強的話，也許會更多地體會到

角色滿足感。最後，子女親職化中所體驗到的各種情緒感受，對其心理結果產生範疇優勢性的影響。諸如不公平感、獲益感等與個人利益相關的感受會更多地影響個人心理症狀(Toro, Schofield, Calderon-Tena, & Farver, 2018)；而罪疚感、角色滿意感等與關係或角色規範相關的感受則會更多地影響個體的人際心理適應。同時，個體化自主性與關係自主性也會展現其範疇優勢性，從而分別對個人心理症狀和人際心理適應產生影響(Yeh, Bedford, & Yang, 2009)。在圖 1 之中，實線箭頭表示子女內部心理因素的影響過程，而虛線箭頭則表示親子間的相互影響。

在心理諮商與治療的實務工作中，困境中的孩子常常被看成是缺損者或無力反應的受害者，但這兩種位置都會讓孩子的處境更加艱難(張美惠譯，2017/2016)。尤其是當子女面對困境做出反應(如親職化行爲)之後，專業工作者仍然給予其反應一種「消極」或「病理」的假設，這無疑是對子女的雙重打擊。在親職化這件事情上面，無視子女主體性的專家只能建議「減少父母的需求」，或增加對子女的「心理支持」，這顯然會將責任完全歸於父母。筆者無意主張父母無須負責，然而這種單向責任的建議的確在很多情境之中無法奏效。也許，學者們應該有另一種視角看待「親職化」，而華人孝道傳統所倚重的「主體性」便是一個很好的切入視角。因此，只有將子女主體性納入量化實證研究之中，檢視不同主體性前提下的親職化行爲、感受及其對心理發展的影響，才算是將親職化放回其理論脈絡之中開展研究。也只有如此，才能獲得關於親職化現象更爲真實、細緻的研究結果，從而爲家

族治療實務工作提供更為科學、有效的理論指導。

收稿日期：109.02.01

通過刊登日期：109.07.08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玉思 (2017)。初中生親職化、自尊與攻擊行為的關係研究。安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安徽合肥。
- 王聃 (2013)。親職化對中學生羞恥感的影響。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上海。
- 石芳萌 (2007)。高中職生親職化，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之相關研究。臺灣師範大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石芳萌、吳麗娟、林世華 (2010)。高中職學生親職化、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之相關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1**(4)，823-846。doi:10.6251/BEP.20091127
- 利翠珊 (1997)。婚姻中親密關係的形成與發展。*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0**(4)，101-128。
- 利翠珊、陳富美 (2004)。配偶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對夫妻恩情的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21**，49-83。doi:10.6254/2004.21.49
- 吳志文、葉光輝 (2011)。雙元自主性的共存與範疇優勢性運作機制：以訊息區辨表現降低共同方法變異。*中華心理學刊*，**53**(1)，59-77。doi:10.6129/CJP.2011.5301.04
- 吳志文、葉光輝 (2015)。工作自主經驗與父母教養行為：雙元自主性促進因素的範疇優勢性檢證。*本土心理學研究*，**43**，3-54。doi:10.6254/2015.43.3
- 吳嘉瑜、張盛堂 (2004)。叫「好孩子」太沉重！？幼年具親職化經驗之性罪犯的人際特色及處遇。*中華團體心理治療*，**10**(2)，19-27。doi:10.30060/cgp.200406.0005
- 李董平、張衛、孫文強、邢文利、李霓霓、吳欣欣、金淼 (2010)。兒童親職化與大學生心理發展的關係：一項回溯性研究。*心理科學*，**33**(03)，639-642。
- 侯季吟、蔡麗芳 (2013)。親職化蘊涵著正向力量？弱勢家庭子女親職化與利社會行為之相關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5**(2)，25-46。
- 張美惠譯 (2017)。闖進兔子洞：魔幻奇境的敘事治療。台北：張老師文化。
- Marsten, D., Epston, D., & Markham, L. (2016). *Narrative therapy in wonderland: Connecting with children's imaginative know-how*.
- 張虹雯、郭麗安 (2000)。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與兒童行為問題之相關研究。*中華輔導學報*，**8**，77-110。
- 張縉鏐 (2018)。台灣貧困家庭親職化兒童的生活樣貌與需求。*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8**(2)，43-86。doi:10.3966/222372402018100802002

- 陳慧珊、吳麗娟 (2013)。大學生親職化現象、個體化程度與身心健康指標之相關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5(1)，103-120。doi:10.6251/BEP.20130121
- 黃宗堅、李佳儒、張勻銘 (2010)。代間關係中親職化經驗之發展與自我轉化：以成年初期女性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33，59-106。doi:10.6254/2010.33.59
- 葉光輝 (2009)。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32，101-148。doi:10.6254/2009.32.101
- 蔡家和 (2016)。探析心學人性論之現代意義：以陽明後學黃宗羲「孟子師說」為例。《陽明學》，45，535-556。
- 楊國樞 (1985)。現代社會的新孝道。《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51-67。
- 楊國樞。(1988)。中國人之孝道的概念分析。載於編者(楊國樞)，《中國人的蛻變》(31-64頁)。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簡匯育 (2010)。高中職生親職化量表編製與其復原力、身心健康之探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 英文部分
- Boszormenyi-Nagy, I., & Spark, G. (1973). *Invisible loyal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doi:10.4324/9781315825939
- Castro, D. M., Jones, R. A., & Mirsalimi, H. (2004). Parentification and the imposter phenomen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2(3), 205-216. doi:10.1080/01926180490425676
- Champion, J. E., Jaser, S. S., Reeslund, K. L., Simmons, L., Potts, J. E., Shears, A. R., & Compas, B. E. (2009). Care-taking behaviors by adolescent children of mothers with and without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 156-166. doi:10.1037/a0014978
- Chase, N. D., Deming, M. P., & Wells, M. C. (1998). Parentification, parental alcoholism, and academic status among young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6(2), 105-114. doi:10.1080/01926189808251091
- Chen, C. Y. C., & Panebianco, A. (2020).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arental chronic illness, parentification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sychology & Health*, 35(9), 1075-1094. doi:10.1080/08870446.2019.1699091
- Chirkov, V., Ryan, R. M., Kim, Y., & Kaplan, U. (2003). Differentiating autonomy from individualism and independence: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internalization of cultural orientation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97-110. doi:10.1037/0022-3514.84.1.97
- Côté, J. E. (1997).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dentity capital mode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 577-597. doi:10.1006/jado.1997.0111

- DiCaccavo, A. (2002). Investigating individuals' motivations to becom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The influence of early caretaking roles within the family.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75, 463-472. doi:10.1348/147608302321151943
- Goh, E. C. L., & Kuczynski, L. (2009). Agency and power of single children in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in urban Xiamen, China. *Culture & Psychology*, 15(4), 506-532. doi:10.1177/1354067X09344881
- Hooper, L. M., Decoster, J., White, N., & Voltz, M. L. (2011). Characterizing the magnitud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reported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7(10), 1028-1043. doi:10.1002/jclp.20807
- Hooper, L. M. (2009). *Parentification inventory*.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19, from <http://guru.louisville.edu/parentification/uploads/1/8/9/9/18990327/parentification-inventory-2009-website.pdf>
- Jankowski, P. J., Hooper, L. M., Sandage, S. J., & Hannah, N. J. (2013). Parentif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ymptoms: Mediator effects of perceived unfair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5(1), 43-65. doi:10.1111/j.14676427.2011.00574.x
- Jurkovic, G. J. (1997). *Lost childhoods: The plight of the parentified child*. United Kingdom: Psychology Press. doi:10.1016/S0145-2134(99)00139-8
- Jurkovic, G. J., Kuperminc, G., Perilla, J., Murphy, A., Ibaez, G., & Casey, S. (2004). Ecologic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on filial responsibility: Implications for primary prevention with immigrant Latino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25(1), 81-104. doi:10.1023/B:JOPP.0000039940.99463.eb
- Karpel, M. A. (1976). *Intrapsychic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the parentification of childre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Unpublished Amherst.
- Katz, E. (2015). Domestic violence, children's agency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Towards a more advanced model. *Children & Society*, 29(1), 69-79. doi:10.1111/chso.12023
- Kerig, P. K. (2005). Revisiting the construct of boundary dissolution.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5. (2-3), 5-42. doi:10.1300/J135v05n02_02
- Kerr, M. E., & Bowen, M. (1988). *Family evaluation: 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Kuczynski, L., Harach, L., & Bernardini, S. C. (1999). Psychology's child meets sociology's child: agency, influence and power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 S (Ed.),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child: Revisioning children as active agents of family life* (pp. 21-51). Stamford, CT: JAI Press.
- Kuperminc, G. P., Jurkovic, G. J., & Casey, S. (2009). Relation of fili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adjustment of Latino adolescents from immigrant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1), 14-22. doi:10.1037/a0014064
- Lee, J. S., & Kim, J. M. (2019).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parentification on their internalized problems between multicultural and monocultural familie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ternalized shame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Child Studies, 40* (2), 39-56. doi:10.5723/kjcs.2019.40.2.39
- Louise, E., Cushway, D., & Cassidy, T. (2007). Children'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 of care giving: A focus group study.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 69-80. doi:10.1080/09515070701217830
- Macfie, J., Brumariu, L. E., & Lyons-Ruth, K. (2015). Parent-child role-confus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an emerging concept. *Developmental Review, 36*, 34-57. doi:10.1016/j.dr.2015.01.002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2003). Models of agency: Socio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ction. In V. Murphy-Berman & J. J. Berman (Eds.),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pp. 18-74).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Mijl, R. C. W. v. d., & Vingerhoets, A. J. J. M. (2017).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arentific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among students. *Psihologijske Teme, 26*(2), 417-430. doi:10.31820/pt.26.2.8
- Mika, P., Bergner, R., & Baum, M. C.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for assessment of parentification. *Family Therapy, 14*, 229-235. doi:10.1124/jpet.104.076141
- Miller, J. G. (2003). Culture and agency: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motiv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V. Murphy-Berman & J. J. Berman (Eds.),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49*, 76-116.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Morris, M. G., & Gould, R. W. (1963). Role-reversal: A necessary concept in dealing with battered child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33*, 298-299.

- Nuttall, A. K., & Valentino, K. (2016). An ecological-transactional model of generational boundary dissolution across development.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3*(2), 105-150. doi:10.1080/01494929.2016.1178203
- Nuttall, A. K., Zhang, Q., Valentino, K., & Borkowski, J. G. (2019). Intergenerational risk of parentification and infantilization to externalizing moderated by child tempera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Family, 81*(3), 648-661. doi:10.1111/jomf.12562
- Prout, A., & James, A. (1997).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 Provenance, promises and problems. In J. A & P. A (Eds.),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pp. 1-33).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 Minuchin, S., Montalvo, B., Guerney, B.G., Jr., Rosman, B. L. & Schumer, F. (1967). *Families of the slums: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structure and trea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doi:10.1093/sw/14.1.138
- Schermerhorn, A. C., & Cummings, E. M. (2005). Children's perceived agency in the context of marital conflict: Relations with marital conflict over time.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1*(2), 121-144.
- Siskowski C. (2006). Young caregivers: Effect of family health situations on school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School Nursing: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Nurses, 22*(3), 163-169. doi:10.1177/10598405060220030701
- Stein, J. A., Rotheram-Borus, M. J., & Lester, P. (2007). Impact of parentification on long-term outcomes among children of parents with HIV/AIDS. *Family Process, 46*(3), 2007. doi:10.1111/j.1545-5300.2007.00214.x
- Sutterlüty, F., & Tisdall, E. K. M. (2019). Agency,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Questioning key concept of childhood studies. *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 9*(3), 183-187. doi:10.1177/2043610619860992
- Titzman, P. F. (2012). Growing up too soon? Parentification among immigrant and native adolescents in German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1*, 880-893. doi:10.1007/s10964-011-9711-1
- Tompkins, T. L. (2006). Parentification and maternal HIV infection: Beneficial role or pathological burd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6*(1), 108-118. doi:10.1007/s10826-006-9072-7
- Toro, R. I., Schofield, T. J., Calderon-Tena, C. O., & Farver, J. M. (2018). Filial responsibilities, familism,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Latino young adults. *Emerging Adulthood, 7*(5), 370-377. doi:10.1177/2167696818782773

- Ungar, M., Theron, L., & Didkowsky, N. (2011). Adolescents' precocious and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families well-being and resilience in five countries. *Family Relations, 60*, 231-246. doi:10.2307/41236761
- Wang, M., Liu, S., & Belsky, J. (2016). Triangulation processes experienced by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1*(6), 688-695. doi:10.1177/0165025416662345
- Yeh, K. H., Bedford, O., & Yang, Y. J. (2009).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he coexistence and domain superiority of individuating and relating aut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4*(3), 213-221. doi:10.1080/00207590701749146
- Yeh, K. H., Liu, Y. L., & Yang, Y. J. (2007). Individuating and relating autonomy in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 In J. Liu, C. Ward, A. Bernard, N. Karasawa & R. Fischer(Eds.), *Casting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pp. 123-146). Korea: Kyoyook-Kwahak-Sa Publishing.
- Yeh, K. H., & Yang, Y. J. (2006).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individuating and relating autonomy orientations in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9*(2), 148-160. doi:10.1111/j.1467-839X.2006.00192.x

Children Agency in Parentification: Inspiration from Studies of Filial Piety

Cheng-Guang Zhang Jing-Wei Liu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derived from family therapy theory, parentification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e field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parentification,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focus on children's unilateral parentification behavior, which is divorced from their social culture and family context, and their results show a "chaotic situation" with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ults coexisting. After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parentification, this article,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filial piety culture, suggests that relevant research pay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children in the process of parentification. Fin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ilateral model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family context of parentification and the dual autonomy of children are incorporated to buil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parentification research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more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ollow-up research. This model determines that children perceive the needs of parentification in the family context and demonstrate the role behavior of parentification, experience the emotional feelings of parentification, and further affect the outcomes of thei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parents' self differentiation can moderate parents' feedback on their children's parentification role behavior, which in turn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role behavior and parentification emotional feelings; children's agenc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f parentification needs and parentification role behavio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fication role behaviors and parentification emotional feelings, and then directly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outcomes.

Keywords: agency, Dual Autonomy Model, filial piety, parentification

Chen-Guang Z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enguang_1211@163.com)
Jing-Wei Liu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